八田與一在臺灣之研究：以臺灣三個版本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對其形象描繪比較為例

劉世閔 [1]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E-mail:sml206@nknucc.nknu.edu.tw

摘要

日本在二戰時在國內發生「米騷動」(搶米暴動）事件，臺灣總督府為配合日本「農業臺灣」的國策，啟動興建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的計畫，八田與一(はったよいち)被任命為此計畫的負責人，大圳完成後，對臺灣的農田水利產生極大效應，也增加稻獲量與品質，本研究採文件分析蒐集相關文獻與三個版本教科書有關八田與一的描述，運用 NVivo 12 Plus 進行自動編碼、矩陣分析與圖，因此八田與一也成為臺灣歷史教科書中極少數被選擇進入教材的的日本人物。他在臺灣國中歷史教科書中是如何被評價的？這些教科書究竟是用怎樣的視野來描述？成為本研究的旨趣。

關鍵詞：米騷動、八田與一、嘉南大圳、教科書、NVivo 12 Plus

A Study of Yoichi Hatta in Taiwan: Taking the Images of the Three Versions of the History Textbook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s an Example

Shih-Min Liu[1],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NKNU

E-mail sml206@nknucc.nknu.edu.tw

Abstract

In the event of World War II, "rice disturbances" (“grab the rice” riots) occurred in Japan. The Office of Taiwan Governor launched a scheme to build the “Project of Chianan irrigation system and Wusanto Reservoir” in line with the Japanese national policy of "Agricultural Taiwan." Yoichi Hatta was appointed a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is Project. After the irrigation system was completed, Taiwan's agricultural hydraulic engineering not only has a great effect, and it also increases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ice. This study uses a documentary analysis to collect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ree versions of the textbook on the description of Yoichi Hatta, using NVivo 12 Plus for auto codes, matrix analysis, and maps. Therefore, Yoichi Hatt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ew Japanese characters in Taiwan's history who has been selected to enter the textbook texts. How is he evaluated in his history textbook in Taiwan? What kinds of visions are used in textbooks to describe him? The two questions ar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Keywords: rice disturbances, Yoichi Hatta, Chianan irrigation system, textbooks, NVivo 12 Plus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1920年9月八田與一(Yoichi Hatta)在臺建造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雖然當時建造大圳費用驚人，引發眾人爭議，但他獨排眾議，堅持十年而完成（蔡嘉信，2011）。

1942年，他後被陸軍以「南方開發派遣要員」身份前進南洋，同年5月8日，所搭14,000餘噸的船「大洋丸」（たいようまる）被美軍「格倫迪亞號」(Grenadier）以魚雷擊中，逃生不及而死，享年56歲（吳文星，2000；林惠源，2003）。

他大半時間在臺灣工作，曾參與臺北地下道、高雄港、臺南水道、日月潭水力發電所、桃園大圳與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等，對臺貢獻良多，成為臺灣歷史教科書中所描繪的人物中極為少數的日本人，本研究希望透過文獻與分析教科書的書寫，讓歷史還原他的風貌，這樣的人物在臺灣歷史上是否不可或缺的？教科書如何書寫他？引發本動機之一。

八田與一在臺灣史上是位特殊人物，這位日本水利工程技師在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逾半世紀後，出現在當前國民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也在報紙上佔極大篇幅，有人為他立銅像，但銅像的頭也被人鋸下，這些舉動想讓他毀譽參半。在臺灣，嘉南大圳被當成美化日人治臺的成就，讓兩任不同政黨的總統親臨他的追思會，顯示尊崇與懷念。另一方面他的斷頭事件，引發臺南地方人士憤慨，間接引發政治事件，因此，本研究企圖從教導國民中學學生的歷史教科書（南一(2016)、康軒(2016)與翰林(2016)）內容的爬梳與選用，檢視當代詮釋的取材觀點，這是研究動機之二。

他是興建烏山頭與嘉南大圳的核心人物，甚至連其妻，位於烏山頭水庫的八田宅外立有銅像。八田的銅像歷經立碑、斷頭與再續，涉及怎樣的時代背景脈絡更迭，他一生的功過在臺灣歷史教科書又該如何判定？誰來判定？這是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一) 陳述三個版本歷史教科書描述的八田與一。

(二) 比較三個版本教科書描述八田與一的異同。

(三) 透過多元文獻與版本比較來論述這位歷史人物。

三、研究問題

(一) 三個版本歷史教科書如何描述八田與一？

(二) 比較三個版本教科書描述八田與一取鏡有何異同？

(三) 透過多元文獻與版本如何論述這位歷史人物？

貳、文獻探討

一、嘉南平原的轉變

臺灣在明朝時期原本是座名叫大員的島，明永曆十五（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人，攻克臺灣，設一府二縣：即承天府與天興、萬年兩縣。以新港溪（今之鹽水溪）為二縣分界，東寧軍師陳永華要鄭氏軍隊採屯田策略(屯墾的田稱為營盤田)，以士兵充當農夫的作法，將從荷蘭人手裡接收的王田改為官田，鄭成功採二十八星宿組織部隊，各鎮分前後中左右五個鎮區(陳名實、王炳慶 ，2010），讓臺灣的嘉南平原留下「營」，例如，左營、柳營、下營、新營與林鳳營；「鎮」，例如，二鎮、左鎮與前鎮；「勁」，例如，後勁；「協」，例如，本協(臺南後壁)、中協(官田)、後協(岡山)；「衝」，例如，右衝後改名右昌，在今楠梓與右昌一帶與「鋒」，例如，右先鋒(善化)、前鋒(岡山)等。這些是明鄭東寧時期的軍事布局與屯田有關的地名(涂志偉，2017；孫媛貞，1935），兵鎮（通常分為前後中左右）成為明鄭軍隊系統的重要組織，先人開闢之功，讓嘉南平原逐漸成為良田處處。

嘉南平原從看天田到穀倉的轉變，是歷經各代努力而來，嘉南大圳對嘉南平原的孕育扮演重要角色。「嘉」是嘉義，「南」則是臺南。嘉義舊名諸羅城，原名諸羅山，是平埔洪雅族Tirocen社名的漢譯（林惠源，2003），原隸屬天興州，城內居民得到清兵奧援，最後平定亂事，乾隆為嘉勉因林爽文起兵叛變亂事而死者，嘉其忠義，旌封為「嘉義」。臺南在明鄭東寧時期稱為「承天府」，原有全臺首府之意，即東寧首都，清領時改為「臺灣府」，後稱「臺南府」。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平原，東起中央山脈，西臨臺灣海峽，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86公里，總面積約4,500平方公里。北起北港溪，地勢平坦，位置跨越雲林，嘉義、臺南與高雄，由濁水溪、曾文溪、北港溪與八掌溪共同孕育，幾代的開墾，加上八田與一建造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讓嘉南平原逐漸變成沃土。

1930 年前，嘉南平原並非如此富饒，原本是鹽分高、缺水的土地，因嘉南大圳的千里水道改良成為臺灣最大的穀倉，荒漠成良田，超過 10,000 公里給水路，總長度 228 公里，當中有多少代的灌溉故事，只是除他之外，難道沒有值得紀念的其他人？臺灣歷史教科書中所欲呈現的主流思潮為何？

二、八田與一與臺灣水利

(一) 生平

八田與一是日本北陸石川縣人，出生於 1886 年 2 月 21 日，亡於 1942 年，1910 年 7 月自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學土木科畢業不久，即渡臺擔任臺灣總督府土

本部技手，1911 年升任技師，1917 年調查嘉南平原水利狀況，並於 1919 年完成嘉南大圳工程設計。翌年，轉任官佃溪埤圳組合(後易名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技師，負責水庫、水圳的建造(吳文星，2000)。這位土木工程師踏遍臺灣各處，讓臺灣此後阡陌縱橫、良田處處。

八田與一素有「嘉南大圳之父」與「烏山頭水庫之父」的稱號。奉命來臺後的他發現嘉南平原亟待灌溉的土地多達近10萬甲，使嘉南平原成為稻米產地，他採用「半水成填充式」(semi-hydraulic fill)工程法建造大水壩，截至1930年5月才順利完工，完成濁水溪導水和排水圳路、重要地點的排水路、重修的舊有排水路、海岸防波堤、防止鹽分滲透及開拓新耕地之設備等。其中烏山頭水庫土堰堤長1273公尺、高56公尺，滿水面積13平方公里，貯水量達15,000萬公噸，為當時東亞規模最大之土堰堤水庫。1931年7月，嘉南大圳組合員工贈送他的銅像一座，以表彰其功勞(吳文星，2000）。建成之後，時任嘉南大圳技師長的八田與一被視為「愛臺灣」典範，奠立在日、臺灣土木工程界的地位。

二戰結束後，西元 1946 年 12 月嘉南農田水利協會特為八田夫婦建造純日式的墳墓，但其生前，鮮少人注意到他對臺灣水利的貢獻，日本人也知之甚微，這號人物在臺教科書中如何被塑造？

1983 年，高雄日本人學校教師文部省海外宣傳員古川勝三蒐集臺、日兩地有關八田與一之資料，於 1989 年出版《臺灣を愛した日本人--嘉南大圳の父八田與一の生涯》一書，為第一本以嘉南大圳的設計監造為中心而呈現的八田與一傳記(吳文星，2000；林金源，2016)，書籍的出版，讓日本朝野逐漸正視這位在臺有水利之功的工程師。

(二) 日本帝國「農業臺灣、工業日本」國策

日本在1918年7月至9月發生「米騷動」（搶米暴動），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糧食短缺問題，王哲（2014）與張軼（2016）指出，由於日本本土供應緊張，大米價格飆漲，買不起大米的群眾約莫1000萬人紛紛上街反抗，日本政府企圖以50,000兵力鎮壓，抗爭持續約50天，最後導致內閣大臣寺內正毅垮臺。

「米騷動」事件後，讓日本政府察覺糧食的重要性，因此加強殖民地臺灣的生產。總督府制定「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基調，1918年日本發生「米騷動」事件後，總督府配合農業臺灣的國策，決心建造嘉南大圳，由八田等八十餘人組成「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開始開鑿嘉南大圳，隔年，八田奉命從事嘉義急水溪灌溉水壩建造可行性調查時，發現急水溪蓄水能力不足，難以符合預期灌溉面積。

同時，意外地發現嘉南平原亟待灌溉的土地多達近10萬甲，於是進而尋找替代急水溪之適當水源，結果發現在官佃溪上游的烏山頭地方有荷治時期和清代建造的小型水利工程遺蹟，接著，在龜重溪上游亦發現適合興建水庫的地點(吳文星，2000)。這樣的實查，讓此巨大建築的構念開始成形。

1921 年，臺灣總督府頒行臺灣水利組合令，開啟臺灣埤圳制度的新紀元(吳文星，2000)。歷十年有成，但死傷不少，1930 年，八田與一於烏山頭水庫立殉工碑來追思殉難者（水庫工程殉職共一百三十四人，死於工程意外或者瘧疾），以供後人憑念追思。烏山頭水庫蓄水量可達一億五千萬噸，在當時是東亞第一，世界第三大水庫。

「嘉南大圳」工期歷時十年（1920-1930），採用現代水利工程技術，工程費計共 5,412 萬日圓，灌溉面積十五萬甲（林名成，2007）。研究顯示，嘉南大圳的建設背後有殖民主經濟掠奪的目的。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可以視為日本帝國對臺灣殖民地的經濟壓榨的建體，主要解決日本國內曾發生的「米騷動」事件，殖民主義敘事模式充滿意識形態的再現與再製造（翁柏川，2010）。

這麼大的建體與建築費，對臺灣的農田水利功效甚大。只是背後的動機真為臺灣人民？還是母國利益？烏山頭是此計畫的心臟，歷經十年，此後旱田變水田，農產增加四倍，成為臺灣的魚米之鄉，然而，日本當時的配給制，臺灣人大多食粗米與地瓜籤的真相，說明嘉南大圳雖對臺灣土地具有貢獻，日本國家主義卻未必對臺人有相對助益。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被派至菲律賓進行棉田灌溉計畫，途中所搭渡輪遭美軍魚雷擊沉，月餘，遺體被尋獲，經火化後被長子帶回臺灣，長眠於此，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投降，在波茨坦宣言中放棄了臺灣，其妻外代樹與八名子女被狼狽遣返，加上思念夫君，9 月 1 日選擇投身烏山頭水庫，享年 46 歲（陳淑容、柳書琴，2013）。人們將八田夫妻合葬於烏山頭珊瑚潭北側，以花崗岩日式墓葬他們。

(三) 銅像割頭事件

八田與一的銅像傳聞由日本雕刻家「吉田三郎」所雕，1931 年運抵臺灣， 1944 年因戰爭需要，很多銅製品成為戰爭軍需的金屬，這座雕像突然失蹤，之後，在隆田火車站的倉庫重新被發現，1981 年，國民政府核准設立八田與一銅像，水利會才將銅像重新豎立在烏山頭水庫的原址，此時，離他逝世已過四十年。

2017 年 4 月 15 日，適值八田逝世七十五周年前，塑像遭中華統一促進黨成員

李某（曾任過新黨臺北市市議員）與友人邱女持線鋸斷頭破壞，銅像的頭顱遭到割除。李某企圖表達當時政府美化殖民歷史的不滿，特別是對當時副總統吳敦義，此一事件後，此舉讓八田與一的知名度大開，引發日本當局注意。八田與一的銅像被不同支持者斬首的理由或許表達彰顯權力與羞辱等因素，銅像所表徵的政治符號，隨時代更迭而有不同涵義，表達不同的史觀與視域。

(四) 八田與一的評價

總計八田與一在臺時間長達32年，評價多是正面的，坊間以八田為主角的漫畫(日本動畫：八田與一，主題曲由臺日混血歌手一青窈主唱）、書籍(古川勝三，於1989年出版《愛臺灣的日本人》一書）、網站(臺大農藝系架設「向八田與一致敬」網站)音樂劇(八田與一清唱劇音樂會），電視劇(客家電視臺的「水色嘉南：八田與一傳」）、新聞報導(民視新聞臺的「臺灣演義」與三立新聞臺的「福爾摩沙事件簿」）路名（臺南市政府於2011年將官田區一路段命名為「八田路」）與設立紀念區不勝枚舉。一時之間，八田與一受到尊崇和懷念，每年5月8日八田與一忌日時，仍有許多臺、日人士在此舉行追悼儀式（吳文星，2000；翁柏川，2010）。2007年7月12日，陳水扁總統頒褒揚令，表彰他對臺灣農業的貢獻。2008年5月8日，馬英九總統前往烏山頭水庫，參加追思會，並宣佈編列經費建立「八田與一紀念園區」，2011年5月8日落成啟用，馬總統、前日本首相森喜朗及其率領之日本國會議員參加落成典禮(林金源，2016）。林金源指出八田與一在臺灣不但赫赫有名，甚至大有「守護神」或「民族英雄」的架式。這樣的社會現象如何產生？罹難後他的故事成為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之一，臺灣人該飲水思源？還是運用此一人物重新思索？不同意識形態的思維影響下，同一人物有不同的想像與詮釋。

但有些文獻則相當批判的，甚至負面的。有研究指陳日本對臺建設是為母國服務，日人對臺民的經濟壓榨也是事實。如林金源（2016）從批判角度分析這號人物：八田與一在臺被神化的怪現象，只是臺獨派媚日大戰略的一環。全臺從南到北、從早到晚，都不乏「再皇民化」、「再殖民化」的活動與理念。而林名成(2007)的研究指出，日人在臺興建「嘉南大圳」的實際受益者是日本人，興建「嘉南大圳」是為日人的利益，而非臺人。當臺灣開始對此八田進行各項記錄同時，也有人提出批判，此論述在於以微觀（Micro）視野，頌揚日人在臺的單一工程建設，但卻未以宏觀（Macro）視野，檢視日本殖民統治的屠殺與壓榨殘酷史實。易言之，他認為臺灣八田與一的現象，只是以微觀方式並沒有從歷史的縱深來全盤檢視這號人物。林名成(2007）研究指出：綠營人士大肆美化日據時期日人治臺的成就，但又絕口

不提日人在臺對臺人的狠毒壓榨。

顯然地，上述文獻對於八田與一的評價是兩極且批判的，不同政治顏色的立場可清楚猜出描述結果，臺灣教科書自然難以全然中立。

三、教科書分析與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特定社會歷史的產物，是統治階級的精神文化體系，潛移默化地透過教科書承載和傳播統治集團或主流的身份文化，運用灌輸或內化的手段達成認同國家和法律的權威。Olson(1989)曾說：教科書具有權威性，合法、普遍與強制的特性。教科書分析是質性研究文件分析之一，傳統臺灣歷史教科書課文是黑白分明的世界，描述人物的方式為正者恆正，負者恆負。但真實世界的人物卻鮮少如此二元分化的，教科書過去通常以正面人物的書寫為主（劉世閔，2018），負面人物較為稀少。在今多元網路時代，教科書已非唯一獲取知識的管道，它是否仍具有如此影響力？

（一）邊緣與主流

Apple（2004）指出：學校教科書傳遞了當權者的價值和信仰，有效消除不那麼強大的群體並強化主流意識形態。重要的是確定誰掌控教科書內容和設計，從而確定包含和排除哪些知識。

課程由邊緣到主流其實是種政治的運作，反之亦然。1996年以前臺灣歷史被邊緣化，課程強調中國歷史，地理，文學和傳統。之後，由於政權轉移，在地文化的重視，成為新課綱的要求。一旦這股潮流與政治思潮結合，臺灣本土化與去中化成為新的教育標竿，教科書的內涵與選材就往政治正確方向前進。

教科書在臺灣教育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意識形態滲透到階級社會的文化領域，透過課程大綱，教科書和課程計劃來影響課程政策。教科書的內容與教師教學方式多少會影響學習者的知覺與態度，教科書是國家堅持的「合法」知識體系，成為特定社會控制方式，對歷史人物的臧否，會影響世代間的「行為」、「思想」和「感覺」，形成特有視域與價值觀，於是世代間產生代溝，這種代溝無形地再製社會階級意識，因此，閱聽不同版本描述內容的教科書，會受其文化與內涵所左右，潛移默化中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認同主流威權，逐漸滲透至學習者的價值與觀感。教科書無異是承載課程政策資訊的有形文件，國家伴隨它的傳輸而改造人民思維。

（二）歷史、國家認同與政治意識形態

意識型態係指國家運用教科書此一合法工具進行教化，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統治者透過其意識與社會價值，投射在教科書所反映特定社會群體或階級特徵的一

套思想體系。

教科書傳遞統治者的意識想法與合法化知識的最佳媒介(Wong & Loveless, 1991)，因此，教科書常為強化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之一，臺灣解嚴後本土意識崛起，教科書也朝向本土化發展，加上1997年4月國立編譯館預算被刪除，迫使它退出編輯教科書的市場，希望減少教科書中政治意議型態之灌輸，教科書市場化後朝多元開放發展。

原本意識形態只是中立的概念，受馬克思影響，意識型態才逐漸有負面的味道。例如，陳伯璋（1988）指出意識型態是指一種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觀念或價值系統，它可做為人類思想的準繩、信仰的規條和實踐行動的綱領。但這樣的想法慢慢受到改變，Apple(1992)指出，教科書如同意識型態訊息系統用以傳遞執政者的社會價值與信念。因此，教科書常成為當政者用以形塑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之一。

（三）教科書的權力、知識與文化再製

Foucault 權力/知識論述，澄清兩者相互依存之關係，知識的選文就是權力的展現，教科書的著作體系也逐漸影響教師選書，人們是如何經驗與理解其所處的世界，權力/知識的關聯，權力與論述是密不可分的；權力內在於論述，論述展現權力；權力像循環於論述內部的血液，而論述猶如權力的脈搏（黃道琳，1986）。

在臺灣關於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多半以社會科為主（例如：林文賢，2008；許毓峰，2004），歷史教材與政治意識型態有密切關係，哪些政治人物被經常提及，課程編排與人物取景受當代意識形態所影響，閱聽不同教科書內涵的世代會形成集體意志造成認知結構代溝，情感認同差異與主導不同的心理信仰。

意識形態具有現實與功利性，林生傳（2000）指出，教育是「維持現存社會形態的有效工具」的國家機器，Pierre Bourdieu 認為教育是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的工具，它透過符應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使得文化重生不斷。由於學校教育有再製社會結構的潛在功能，教育系統透過教科書輸送，成為社會階級再製的工具，來遂行主流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識，維護其基本利益。Bourdieu 提出教育是象徵性暴力理論(the theory of symbolic violence)，因為它強化了某些價值觀，規範和獨斷規則。提供的理論框架使我們能夠說明正式課程在強加某些意義和意識形態系統中的作用。作為當權者提出的強迫文化武斷的工具，學校是習慣的生產者，使知識的非難和分配合法化(Bujorean, 2015)。教科書具備促進國家理想與意識形態能團結政府與人民的功能，是重要的文化資本之一，主流團體藉由符號的編製和解讀，來宣揚其主導的意識形態，教科書就容易成為政策宣導與教化的工具。

（四）教育與再製

教育內涵透過教科書可成為文化再製的工具，有些文化或語言被視為崇高，相對地，有些則被遺忘或刪除；有些歷史人物被歌功頌德，有些則被批評體無完膚；開國者成聖/明君，亡國者成昏/暴君，但這些是歷史鐵則？若是，課文背後所欲表達怎樣的企圖？如此印記若未清楚闡釋，是否復刻在學生身上，進而宰制其心靈並控制社會秩序？

若用Bourdieu的觀點，學校教育要複製誰的文化？正如Bourdieu討論強調慣性時那樣，我們是透過身體學習和執行來吸收的社會規範和價值觀(Marshall, 2011)。學校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械」（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Alrutz, 2003)，持這種觀點者將教科書視為學校反映國家體制的工具之一。

（五）從中國化到臺灣本土化

以往臺灣的教科書在國民政府時期視相當中國化的，周淑卿(1998）指出，國定課程的內容主要任務在於「為國家考試提供架構」。在反共復國的前提下，教科書是完成此使命的工具。卯靜儒(2002)指出，臺灣在教育改革以後，變遷中的國家認同的議題也成為課程路線改變爭議之所在，鄉土語言透過本土化以「被救贖」姿態到成為正式課程之一，以臺灣本土為核心的本土運動日漸興起，九○年代初期臺灣認同的論述逐漸浮現。

（六）族群與認同

教科書的焦點從「自身」到「他者」，族群認同才能逐漸產生，族群認同是個體對己身隸屬身分確認與情感歸屬，因而產生知覺、感情與歷史記憶，主觀的族群認同發展到極致或許衍生出種族主義，因而對其他族群的歧視與壓迫。一旦形成文化種族主義，仇外與排外的情緒也會在教育歷程中養成。

王玲(2008)指出，教科書把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知識納入課程範疇，以法定知識的形式在全社會範圍內推廣，意識形態具有批判性和傳承性的特點，這是因為意識形態雖然是特定社會歷史的產物，但其中的某些因素，道德風俗、政治傳統等，往往經歷百年甚至千年都依然具有生命力。當意識形態轉化為社會研究教學時，這種意識形態通過挑戰各國為了驗證其正義和權威而堅持的歷史神話來表達（Loewen, 2009）。

《孟子．盡心下》:「盡信書，不如無書。」書本是知識教材之一，知識的通則會隨時代而轉變，孟子期盼學生別輕信課本內容，教師是進行知識傳授的核心人物，教材如何進行教學仍有待教師的轉化與信念，培養學生思辨能力更加重要。

但若教師只是照本宣科，那麼教科書就易質變為洗腦工具。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資料蒐集

質性研究本質比較屬於政治性的，不同於量化研究強調中立性，質性研究者經常運用文件分析取得資料，教科書意識型態較適合採用此法，它本身是非互動（inactive），詮釋與政治性的，這種符號控制體系若以某族群為中心，就易邊緣化其餘族群的文化。為了瞭解教科書的政治意識形態，本研究探討教科書的內容在整個環境脈絡中所呈現的意義。

本研究以課為單位，主要採取電子教科書為主的內容，蒐羅南一、康軒與翰林在 2016-2017 年的歷史教科書版本，將這些教科書的內容集結成文件檔案並賦予代號，以文件分析法及詮釋學為研究方法，只針對「教科書」文本內容或圖畫資料中的資訊描述「八田與一」議題進行研究，當中提到八田與一總計有三課。例如，「南一 106 下歷史 2 課本_CH2」，就是指南一版 106 年下學期歷史課本第二課。佐以八田與一相關文獻，總計從華藝(CEPS)取得 12 篇相關期刊，SDOL 總計 29 篇。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內容分析法，運用 NVivo 12 Plus（以下簡稱 N12）的四種功能分析三個版本的教科書：

(一)運用文本搜索形成節點

如欲形成節點，首先運用「節點」，探索(Query)的文本搜索(Text Search)，這是種以內容的關鍵字為本的編碼方式，可迅速掌握關鍵字所在鄰近範圍並使用編碼帶進行檢視。例如，本研究進行「八田與一」的搜索，「選定項」處選擇南一、康軒與翰林總計131課課文，選定「拓展至」的「自定義鄰近區」，然後點選「同一段落」經「運行查詢」後，得到三版本課文有關「八田與一」的相關節點，打開節點可以看見其相關內容、參考點與覆蓋率。教科書的文字運用「標楷體」處理，分析與詮釋的節點則運用「細明體」處理。N12的參考點(Reference)可以顯示或隱藏有關每個編碼參考點的信息，可以顯示第幾筆的編碼參考點數，節點編碼參考點的數量。當游標置於參考點，就可以鏈接回原來的材料來源。覆蓋率可顯示或隱藏有關每個編碼參考點的覆蓋率百分比，覆蓋率顯示被編碼的段落在整篇材料來源所占的比率。例如，「參考點1-3.12% 覆蓋率」，參考點1表是第一筆被編碼的節點段落，占整篇材料來源3.12%，易言之，那段被編碼的文字在100個字當中，占了3.12

個字。這與以往使用行碼不同，覆蓋率是種相對於材料來源的位置，可以知道編碼的比率，而非起迄的行碼數目。

(二)運用探索示意圖探究節點的相關內容

在 N12 的項目(Project)將標題設定為「教科書版本」，匯入三個版本教科書與相關圖片，在「教科書版本」項目的節點(Nodes)中，點選「八田與一」的節點，然後，打開 N12 的「探索」的「探索示意圖」(如圖 1)，就可以輕鬆獲得以八田與一為節點的相關分佈內容(如圖 2)。從圖中發現八田與一節點分佈的相關案例與文檔，每個案例與文檔均能打開看到詳細的描述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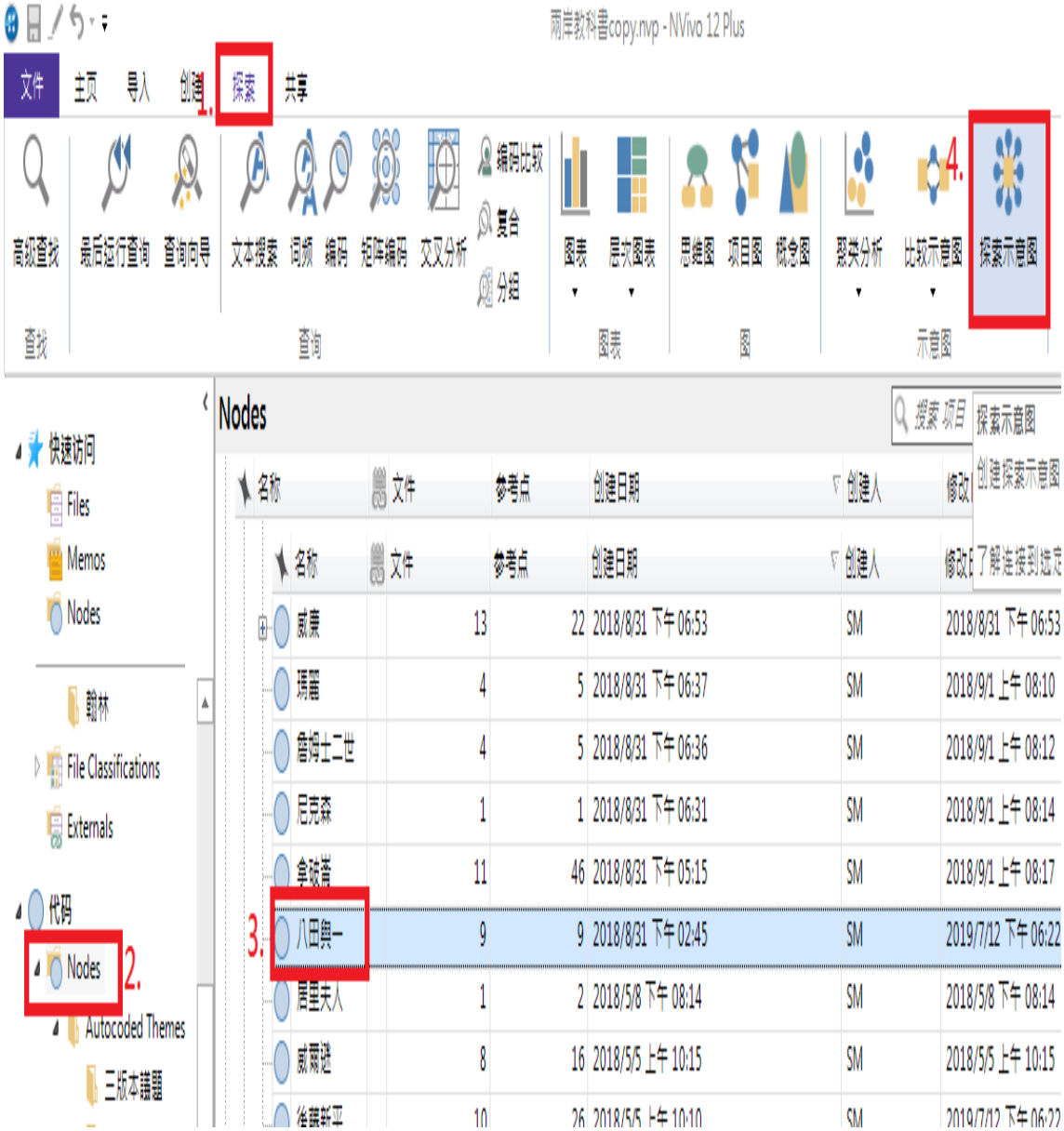

圖 1 打開「八田與一」節點的探索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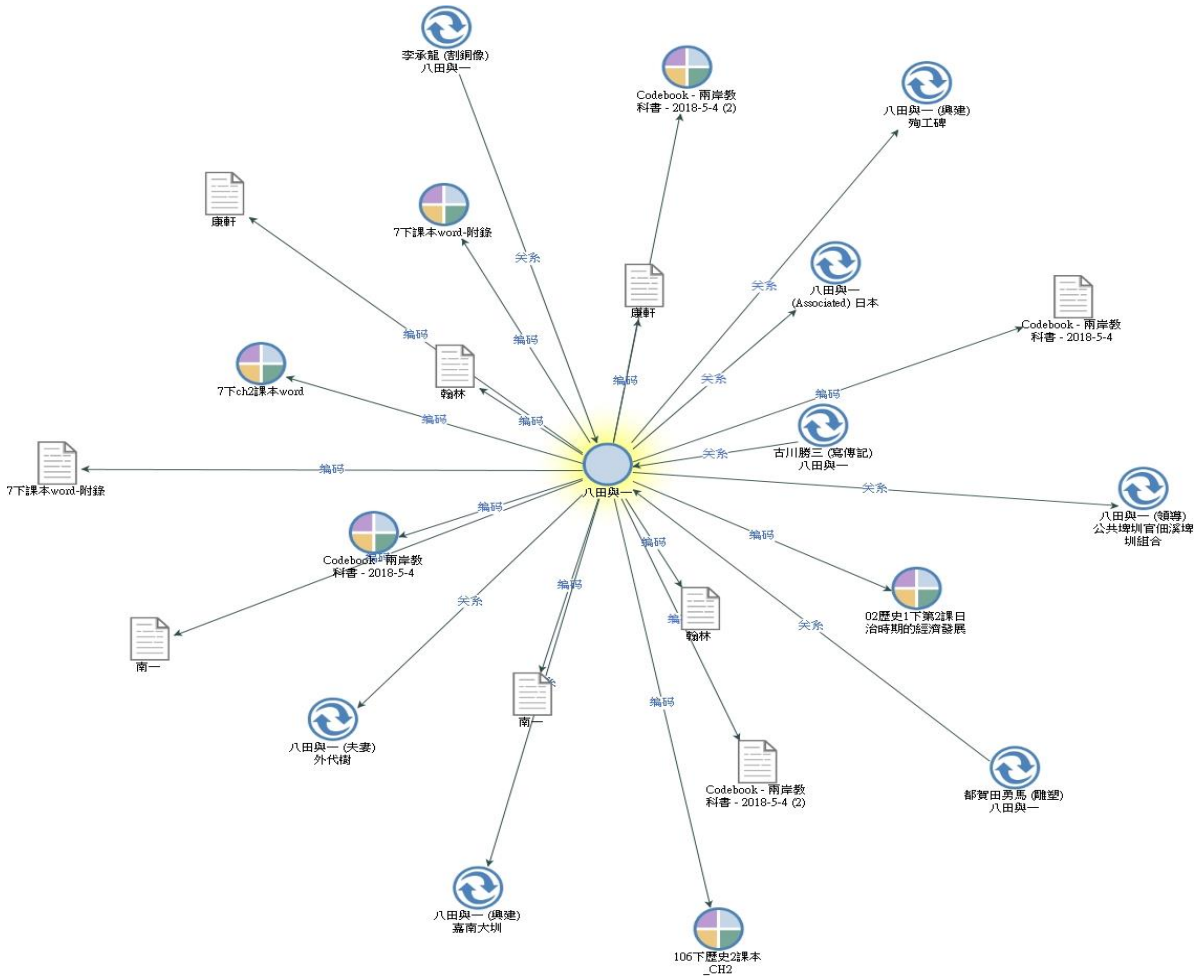

圖 2 八田與一探索示意圖

經 N12 自動編碼的識別主題，在三個版本教科書找出 23 項相關議題，並與三個版本進行矩陣分析，從中可以發現三版本重視主題的差異(如表 1)：

表 1

三版本教科書自動編碼識別主題的矩陣分析表

	A ： 南一	B ： 康軒	C ： 翰林
1 ： 舊慣	3	0	0
2 ： 調查	4	3	3
3 ： 需求	1	3	1
4 ： 政府	2	2	0
5 ： 新式糖廠	1	0	3
6 ： 蔗糖	1	0	2
7 ： 普查	2	1	0
8 ： 建設	5	3	3

9 ： 工業	2	3	3
10 ： 基地	1	1	3
11 ： 日治	3	5	6
12 ： 土地調查	1	1	2
13 ： 農業	1	5	5
14 ： 總督府	2	7	4
15 ： 稻米	1	1	1
16 ： 民政長官	1	1	1
17 ： 經濟	2	4	5
18 ： 貨幣	2	1	1
19 ： 農作物	1	1	1
20 ： 製糖	0	2	1
21 ： 水利	2	4	3
22 ： 南進政策	0	2	2
23 ： 經濟發展	0	1	2

經矩陣(Matrix)分析，南一、康軒與翰林版在與八田與一相關議題的各節點描述，翰林版著重「新式糖廠」與「土地」上，康軒著重在「南進政策」與「土地」，南一版著重「舊慣」與「新式糖廠」，如圖 3，若用分組查詢結果如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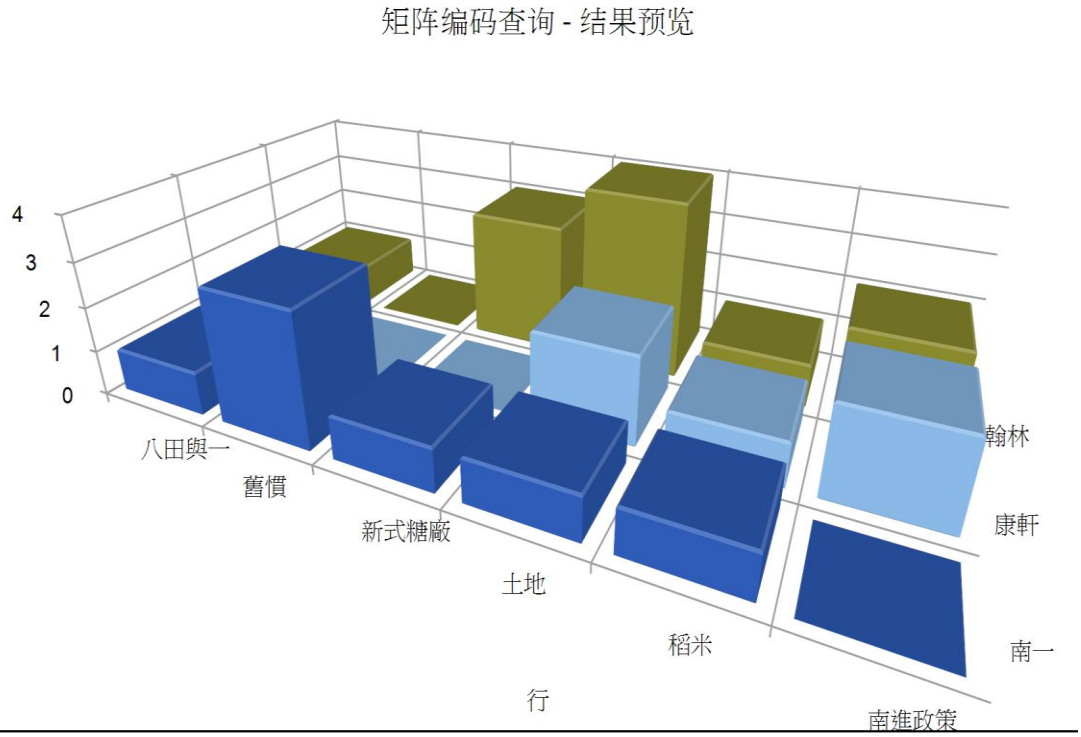

圖 3 三版本在八田與一相關議題矩陣節點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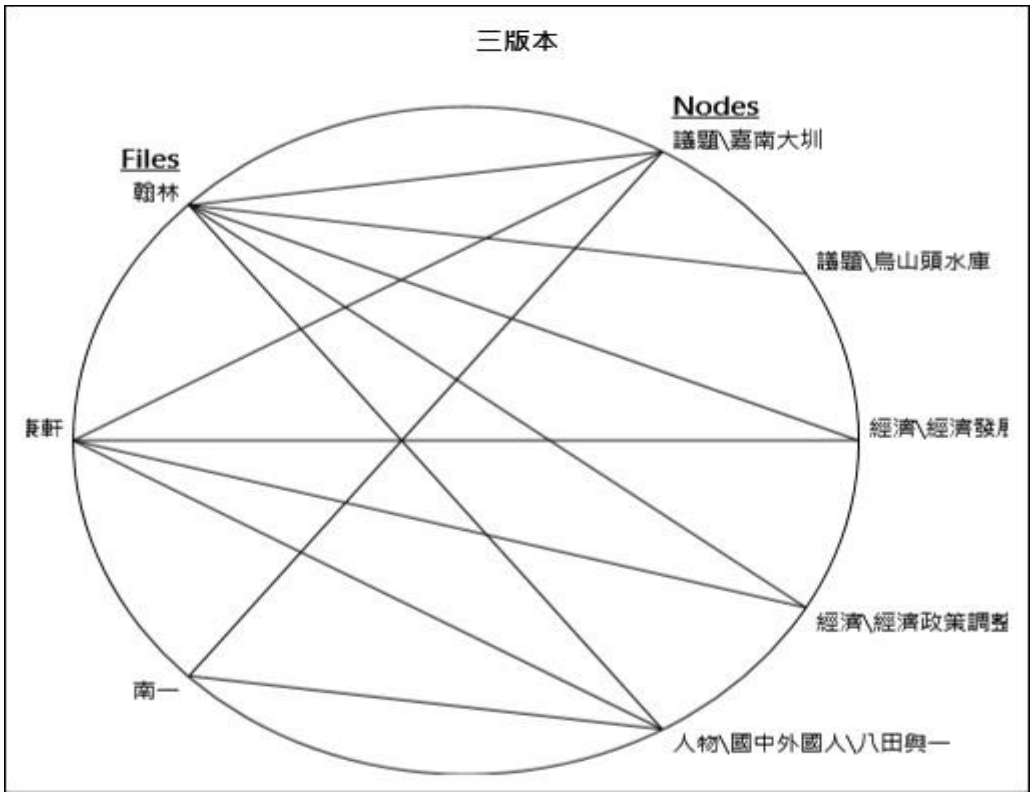

圖 4 三版本的分組查詢

(三)運用項目圖分析節點的關係

N12的「項目圖」（Project Map）是種用來繪製項目項關係的圖，如果已整理好材料來源、節點與關係，項目圖提供不同的排列法，只要在左上方的「佈局」(layout)選擇想要方式，就可以看到圖示區的物件做出相應的排列變化。項目圖是用來處理項目項間的關係圖，此種圖有四種變化：分層有向項目項關係圖(layered directed graph)、分層（hierarchical）、環形（circular）及有向（directed）。這些圖可以讓研究呈現更清楚知道節點的脈絡與關係。

三、研究工具

質性研究以研究者為研究工具，我從事質性研究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以往讀過史地組，從事過多年的教科書研究，在大專院校從事多年質性研究教學，並有多本相關NVivo系列書籍出版，這些經驗足以從事文件分析研究。

我從一位臺灣人，更以人的視域來探討教科書中的日本人物，重要的是若能從官方知識體系解構教科書中人物的選取、編輯與描述，期盼還原人物的脈絡與書寫。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三個版本歷史教科書如何描寫八田與一

日本殖民臺灣不久，日本本土發生「米騷動」事件，加上1931年中日九一八事變發生，臺灣戰略地位越形重要，總督府秉持「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國策，將臺灣當作「稻米」和「蔗糖」的農作物生產供應地，積極推動農業改革工作，把官佃溪埤圳規劃成嘉南大圳，大圳完成後，擴大臺灣的耕作面積，彌補水量不均與不足的問題，1939年總督府開始實施「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採取稻米專賣政策，稻量生產大增，且大量輸往日本，例如，1935-1938年間，臺灣出產的稻米，卻有50.8%輸往日本(黃智賢，2017)，此輸出量也表示臺灣稻米的生產目的。

日本總督府大量也引進新式糖廠，使蔗糖質量大為提升，但臺灣佃農負擔的地租也因而上揚，臺灣有句俗諺：「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日本公司）磅。」就是說明日本母國壓榨殖民地蔗農的具體說明，南一課文中談到「使嘉南平原農作物產量大增」，而日本對臺灣殖民壓榨與日本國內「米騷動」的部分就「空白」。經分析三版本主要的編碼節點，以項目圖的有向圖展示(如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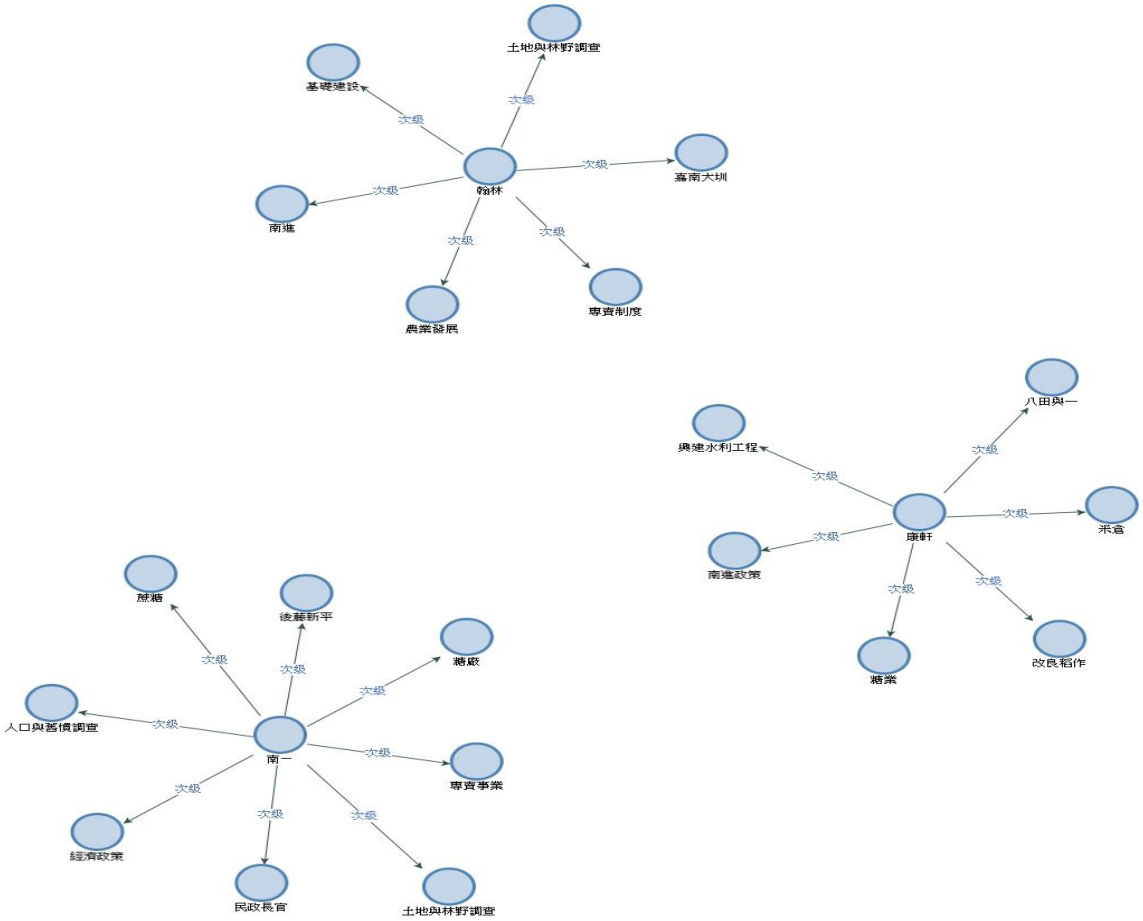

圖 5 三個版本教科書編碼節點有向圖

(一)南一版

強調日本國內需求，設定「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經濟政策，蔗糖與稻米是民生首要物產，水利工程是促進農作物產量的重要手段。

<Files\\南一\\南一106下歷史2課本_CH2> - § 已編碼 3個參考點 [9.30% 覆蓋率]

參考點 1 - 3.04% 覆蓋率

總督府為滿足日本國內民生需求，而實行「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經濟政策。臺灣出產的蔗糖、稻米與特產品皆大量運銷日本。

参考点 2 - 2.07% 覆盖率

總督府請專家改良臺灣稻米品種，研發出符合日本人口味且產量較高的「蓬萊米」。

参考点 3 - 4.19% 覆盖率

總督府為增加蔗糖和稻米的產量，除引進新式技術與改良品種外，還在各地興修水利工程。其中以日籍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建造的嘉南大圳規模最大，使嘉南平原農作物產量大增。

三個版本中，南一使用八田與一內容並不多，重點在他建造的嘉南大圳，使稻作量增加。

(二)康軒版

重點在於日本總督府重整舊有埤圳，特別是嘉南大圳，不但改善農產稻作，更供應日本國內的需求，每年從臺灣大量進口，大圳完成改善了洪水、乾旱、鹽害等問題，讓稻米的種類逐漸改良，文中談及八田對嘉南大圳之貢獻。其中臺灣很多知名米食點心，如米苔目、板條、蘿蔔糕、碗粿均運用此米製作；蓬米係由日本稻作專家磯永吉改良而成，米酒就是用此米釀造，他使臺灣稻米的質量提升，因此被尊稱為「蓬萊米之父」。

康軒版教科書提到嘉南大圳提升稻米與甘蔗的產量，提供日本的需要，八田與一貢獻卓著，課文提供八田與一全身坐像、嘉南大圳、稻作與甘蔗等照片(如圖6)。

<Files\\康軒\\02歷史1下第2課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 - § 已編碼 2個參考點 [6.12% 覆蓋率]

參考點 1 - 3.12% 覆蓋率

總督府為發展農業，整修舊有的埤圳……提高稻米、甘蔗等作物的產量，以供應日本國內的需求。其中，八田與一設計建造的嘉南大圳規模最大，使嘉南平原的農產品產量大增。

康軒的課文是用「他們」的「米倉」來形容臺灣，易言之，臺灣當時的建設，其實是要配合大和民族而設，並且因此完成亞洲最大的水利建設：

參考點 2 - 3.01% 覆蓋率

日本統治臺灣後，希望在臺灣建立他們的「米倉」……日本的稻作專家磯永吉耗費十多年……選育出能在臺灣生長的「蓬萊米」，使臺灣稻米的品質和產量都大為提升。八田與一自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便來臺灣任職，當時臺灣西南部缺乏大型灌溉設施，而且有洪水、乾旱、鹽害等問題……經過十年的努力，於西元1930年完成亞洲規模最大的水利設施(許雪姬，2004)。

（三）翰林版

翰林版強調嘉南大圳是日治時期最大水利工程，提高水稻與甘蔗的農產量。課文中提供嘉南大圳鳥瞰圖與八田與一銅像照並陳，說明嘉南大圳完成後，將臺灣水旱田比例以折線圖清楚呈現，水田的增加說明大圳的功用。

<Files\\翰林\\7下ch2課本word> - § 已編碼 2個參考點 [6.80% 覆蓋率]

參考點 1 - 3.82% 覆蓋率

總督府為了發展農業，興修大型水利設施，例如：1930年，八田與一設計完工的嘉南大圳，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嘉南大圳灌溉嘉南平原的土地，大幅提高了水稻、甘蔗等農作物的產量。

1930年，八田與一完成嘉南大圳前，臺灣旱田大約占65.5%，水田僅34.5%，4年後，臺灣的水田比例首度超過旱田，兩者的比例約7：3，翰林版以折線圖顯示嘉南大圳對臺灣土地的影響。

二、比較三個版本教科書描述八田與一的異同

康軒版教科書從事實著手，日本來臺後希望建立「他們」的「米倉」。可以看出康軒的編者在族群認同上做出「己身」與「他者」的區隔。課文中也介紹稻作專家磯永吉改良臺灣蓬萊米十多年，讓臺灣稻米在質量上提升。而八田與一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來臺，經過十年努力，終於完成亞洲最大的水利設施。

根據三個版本課文所歸納的節點八田與一進行N12的「探索」內的「詞頻」分析結果顯示，水利(出現6次，加權百分比1.50)、作物(4次，加權百分比1.00)、工程(4次，加權百分比1.0)與灌溉(4次，加權百分比1.0)等最常出現，「詞頻圖」如圖6：

圖6 八田與一課文的詞頻分析

從臺灣三個國中歷史版本教科書的比較，大體說明八田與一在嘉南大圳的貢獻，完成亞洲規模最大的水利設施，使嘉南平原農作物產量大增，改善稻作的品質與產量。三個版本所採用的圖片也都大同小異，均以八田與一的全身坐姿銅像與嘉南大圳的樣貌為主。

伍、結論與省思

一、結論

哪些人該被置入歷史教科書中？誰來決定？為何放入這些人物？學生學習後有何觀感？過去，不管是潛伏或公開，教科書是當權者傳播有利於其統治主流意識形態的利器之一，會影響學習者的思想具潛移默化的作用，同樣地，當個體的潛意識被意識形態綁架，那麼其視域自然只關注其所自認的正義。

(一）教科書與政治

臺灣開放教科書市場後，教科書的選用權歸屬於校本管理，只用課程綱要來規範，綱要是指導教育、教學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是編寫教科書的依據，教科書係依據教學大綱編輯而成的教學用書，早期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負責，臺灣書店印製，從上而下一條鞭，自從校園權力結構從此改變，編纂權從政府「統編制」改為開放民間編定的「審定制」，學校可以集體參與遴選教科書版本，有些人物消逝，有些人物增加，有些內容被增添，有些則被改寫，消長之間受到怎樣的思潮所影響？

教科書是學生學習知識的重要材料與媒介，知識的實踐與轉化過程中，教科書

扮演重要但非唯一，必要而非充分的角色（劉世閔，2007）。在當今多元媒體世代，雖然教科書的品質與內涵會影響學習者學習的良莠，但紙本素材的教科書已非教學內容唯一來源，課堂中培養學生思辨能力更重要。

教科書分析中，常被用來理解學校課程設計的社會文化脈絡，學習者的歷史記憶是否產生國家認同？教科書本身是政治的，有些內容被強化、扭曲、刪除或淡化，背後有其目的與企圖，教科書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昭然若揭，強化國家認同也成為各國教科書常見的內涵與手段。

（二）教科書與認同

日人八田與一為何被列為臺灣歷史教科書的重要內容？以本土化概念分析，自然要歸功於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的完成，對臺灣農田水利有極大助益，若是把不同版本教科書擴大為不同國家間的比較，那麼就會更有意思。

教育真的難逃政治思維的遮掩與干涉？認同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學校就容易被視為意識形態的國家工具，八田與一的書寫，讓某些人擔心臺灣人的漢族血統，卻有個日本國籍的想像，臺灣早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逾半世紀，一個對臺灣有貢獻的日本人成為政治攻防的人物，有人紀念，有人想斬首他的銅像，教科書為何會出現「八田與一」？他的出現顯示怎樣的價值觀？本文企盼別因政治意識形態而影響下一代對他的理解與判斷。有些研究指出，八田與一是臺灣日治時期對臺水利有具體貢獻的人物，需在乎其國籍？

對人類產生影響的人物不必強分顏色或陷入國籍的二分，若以他者形象描述，八田與一的成就來自於他對這塊土地的貢獻，而非因他的國別。完成臺灣水利最重大嘉南大圳工程的八田，死後還需要被這樣指手畫腳？他需要怎樣的評價？只是臺灣不僅只有嘉南大圳，對臺貢獻者仍有許多，那麼，把他納為中學鄉土與歷史教材的一部份的目的為何？

臺灣歷史教科書需要怎樣的民族信仰？教科書中的人物由誰界定？從上述文獻可歸納出八田與一的角色，容易簡單歸類為殖民侵略或珍惜臺灣兩項概念，但是否能還原八田與一的實際樣貌？本研究先建立八田與他人間的關係形態，再讓兩兩間的節點構成關係，如文獻所提八田與一的人際脈絡關係（如八田與一與外代樹是夫妻）與重要事件（如八田與一興建嘉南大圳），由於N12可以來回牽曳出與八田相關節點，也可以看出這些節點在教科書版本的分布位置所形成的關係(如圖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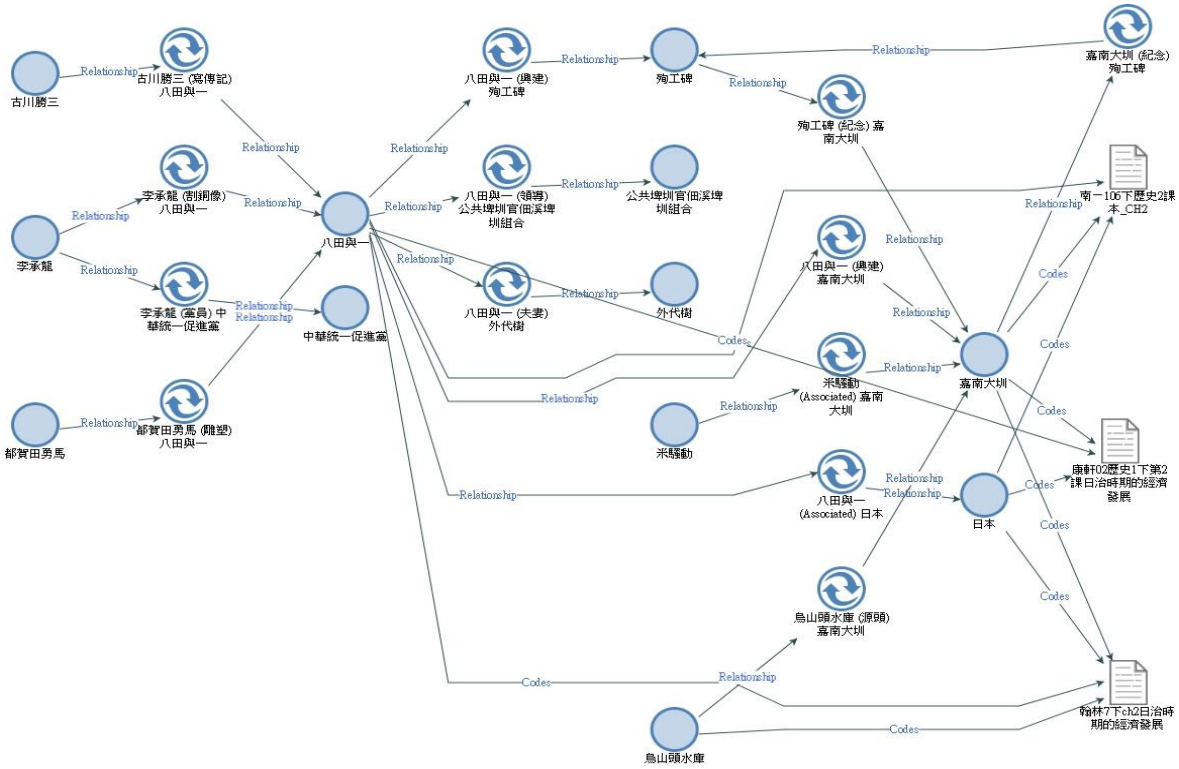

圖 7 八田與一在文獻與教科書分層有向項目項關係圖

若單就三個版本教科書的編碼節點分析，運用 N12 的分層圖分析三個版本內容的節點議題(如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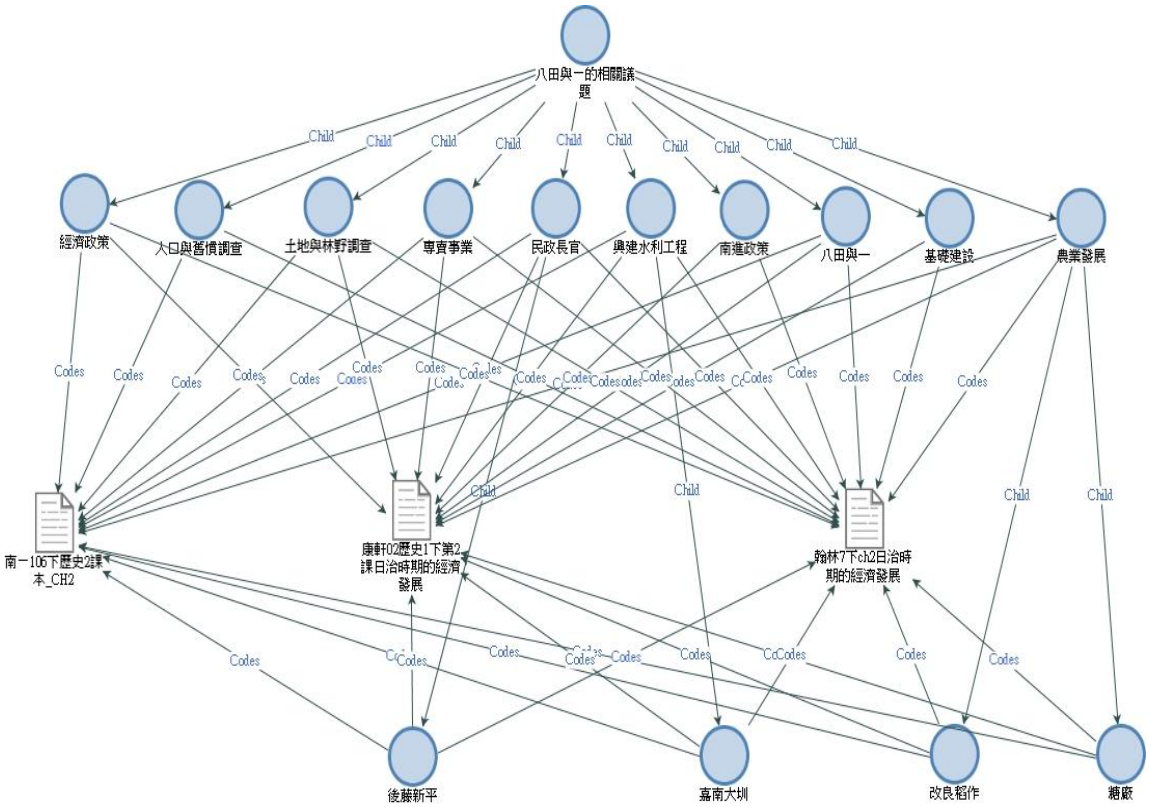

圖 8 三版本教科書描述議題分層圖

根據文獻，臺灣的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興建來自日本本土的「米騷動」，由於日本本土稻米不足，造成搶糧暴動，種下在殖民地興建嘉南大圳的原因，但圖 11 檢視臺灣三個版本歷史課文集中在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的建造，並未提到「米騷動」事件的隻字片語，只提八田與一對臺建設的功績。八田與一是臺日連接臍帶？嘉南大圳的建設對臺灣是加分？是殖民時期的印記？或奉行建造的建物？

上述文獻指出，八田是一位日本人，一位水利工程的執行者，忠於日本，愛護日本當時的殖民地臺灣，為日本殖民政權而建設，教科書描述的內涵對八田與一算歌功頌德？是否顯示我們被再殖民？

二、省思

華人歷史向來深受「成王敗寇」與「時間割裂」的鐵律所左右，多少影響教科書中在角色甄選、取景與情感描述。這些歷史人物的選取與書寫，可以看出背後的假設與邏輯，若沒有這般的比較，很難察覺意識形態在教科書中的作用與對閱聽者的影響。

八田與一自大學畢業後，大半輩子在臺渡過，對他來說，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他受命對這塊土地奉獻與努力，本天經地義。他在臺灣建設了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成為當時東南亞最大、世界第三的建體，讓嘉南一帶增益許多耕地，旱田變水田，改善稻作質量，但他的所為是否如教科書中的描述為臺灣而改變？還是為日本帝國的目的別有所圖？而去除初始動機外，整個水利工程結果對臺灣土地改良與稻作收穫是具有重大貢獻的，只是工程完成後，對當時的臺民是助益還是壓榨？因此，歷史教科書選取的人物，有時可以選擇典範人物，讓人民學習與效法，有時卻會激發不同社會尖銳的矛盾與代間的鴻溝，因此，歷史人物的慎選相當重要。

對臺灣學生的學習心理來說，臺灣歷史教科書描述八田與一之於嘉南大圳比起大陸李冰之於都江堰不至於那麼疏離，問題是歷史教育的重點是了解真相？還是服務於政治正確？忽視真的可以遮掩八田對這塊土地的貢獻？若解除國家認同與歷史糾葛，若臺灣歷史上少掉這號人物，若臺灣土地上沒有嘉南大圳，臺灣農業會如何？

明鄭早就對嘉南平原進行屯田政策，八田與一算是臺灣相當熟悉的日本人，他算是在地貢獻，至於他動機為何？他扮演總督府政策執行者的角色，如同清朝曹瑾的曹公圳，這些執行者的角色或不可能瞭解其背後的殖民策略與治理。但教科書可以在刻意政策主導下，成為意識形態與政黨宣導政策的工具，特別是政治力的介入。

我們是教科書中的「局內人」、「局外人」還是身陷其中的「局中人」？八田

究竟是怎樣一個人？透過本研究希望還原他在日治時期的角色形象，有必要強化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地位？當臺灣陷入顏色意識形態彼此斬首的暴力行動時，我們是否更該深思臺灣核心價值何在？

參考文獻

王玲（2008）。課程政策的意識形態研究。**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3***(3)，127-131。

王哲（2014）。日本“米騷動”影響淺析。**黑龍江史志，11**，242。

卯靜儒（2002）。認同政治與課程改革：以鄉土課程為例的課程社會學分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2**（2），1-27。

吳文星（2000）。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8**，159-170。doi: 10.6243/bhr.2000.028.159

周淑卿（1998）。國定課程: 徘徊在自由與控制之間。**課程與教學，1**（4），13-28+134。

林文賢（2008）。**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中的臺灣主體意識變遷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

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臺北：巨流。

林名成（2007）。綠營不應認賊作父－八田與一的神話。**海峽評論， 198**， 61-62。doi: 10.29925/srm.200706.0013

林金源（2016）。迷失的臺灣：「不朽」的八田與一。**遠望雜誌， 332**，15-18。

林惠源（2003）。**嘉義藝文發展的歷史觀察**（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南。

涂志偉（2017）。陳澤、林鳳、蔣毅庵在臺灣形成的聚落地名與史跡。**臺灣源流，80/81**，63-67。

孫媛貞（1935）。明代屯田制研究。**食貨半月刊，3**（2），26-42。doi: 10.6436/shf.193512.0008

翁柏川（2010）。天使？還是魔鬼？－《八田與一》影片的殖民敘事模式。**文化研究月報，109**，頁 53-68。 doi: 10.7012/csm.201010.0053

張軼（2016）。“米騷動”和日本媒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史天地，1**，79-82。

許雪姬主編(2004)。**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

許毓峰（2004）。**解嚴前後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中的臺灣圖像**（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臺北。

陳正美（2011）。**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臺南：臺南市文化局。

陳名實、王炳慶 （2010）。鄭成功與臺灣地名。**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8**（1），10-13。

陳伯璋（1988）。課程、教學與意識形態。載於陳伯璋（編），**意識形態與教育**（頁167-186）。臺北：師大書苑。

陳淑容、柳書琴（2013）。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23**，175-206。

黃智賢（2017）。八田與一的「頭」。**海峽評論， 317**，65-67。

黃道琳（1986）。知識與權力的毀解：米修・傅柯及其思想。**當代，1**，22-23。

劉文忠、董治安(1993)。**呂氏春秋。**臺北：錦鏞。

劉世閔（2007）。從權力結構的角度論述分析臺灣教科書政策。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編），**教科書制度與影響**（頁95-125）。臺北：五南。

劉世閔（2018）。NVivo 11 Plus的社交網絡分析在個案研究之運用：以七次國編版國語教科書的負面人物為例。**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1），317-335。

蔡嘉信（2011）。「草地」的變遷：一個農村聚落地景的考察。**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 49**（4），89-137。doi: 10.6431/twjhss.201112.0094

Alrutz, M. (2003). *Should Kids Be Allowed to Burn the House Down? Interrogat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and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Drama Classroom*. Retrieved from ERIC database. (ED480253)

Apple, M. W. (1992). The text and cultural politic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 4-19.

Apple, M. W. (2004).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ew York: Falmer Press.

Bujorean, E. (2015). The discourse of majority in Romanian textbooks: Nationalism versus europeanism.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80,* 502-509. doi: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5.02.151

Loewen, J. W. (2009). *Teaching what really happened: How to avoid the tyranny of textbooks and get students excited about doing history.*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Marshall, L. (2011). The sociology of popular music,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aesthetic autonom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2*(1), 154-174.

Olson, D. R. (1989). On the language and authority of textbooks. In S. de Castell, A. Luke, & C. Luke (Eds.), *Language, authority and criticism: Readings on the school textbook* (pp. 233-244). Philadelphia, PA: Falmer Press.

Wong, K. K., & Loveless, T. (1991). The politics of textbook policy: Proposing a framework. In P. G. Altbach (Ed.),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and pedagogy* (pp. 27-42).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教科書]

南一(2016)。**106下歷史第2課 經濟的發展。**臺南：作者。

康軒(2016)。**歷史1下第2課 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臺北：作者。

翰林(2016)。**社會7下第2課 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臺北：作者。